我很好

□李良旭

每次打电话回家，问父母亲身体怎么样。已是80多岁的父母亲，在电话里总是欢喜地答道，我们很好！一句“我们很好”，顷刻间就让我无端焦虑的心，变得平和、安静下来。

“我们很好”，一句简单的话，远胜过千言万语，就让我们理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全部内涵和真相。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们很好”这句话更隽永和深刻了，它让我们有种端坐云端的幸福和美好。那就是，父母的安康，是我们儿女最大的一种幸福和甜蜜。

前几天，抽空回了趟家。一进家，见母亲还睡在床上，床头柜上摆满了瓶瓶盒盒的药，周遭萦绕着一种阴郁和沉重。我不安地问母亲，怎么啦，不舒服吗？母亲抬了抬身子，做出努力的样子，微笑道，我很好，只不过想休息一下。见掩饰不了，父亲在外悄悄地告诉我，这几天，你母亲生病了，一直在医院吊瓶、吃药。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父亲说，我们很好，一点小困难，我们能够克服。

瞬间，我的眼睛变得一片朦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亲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好。这句让人心痛、让人心酸、让人泪眼婆娑的话，一下子直抵人内心的柔软。我忽然想到，“我们很好”这句话，是父母亲平时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那是为了让我们儿女心安、不要牵挂、好好生活。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抚慰和孝顺。那里面，分明流淌的是一种滚烫的、化不开的血脉和亲情啊。

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幕情景：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民工们正挥汗如雨，加班加点地抢工期。这时，一个民工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将手往衣服上使劲搓了搓，然后，将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他看了看手机的号码，目光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他打开手机，说道，妈，是我，我很好。这儿工作很轻松，一点都不累。我现在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呢！工钱发过了，我给您还买了一件小皮袄，听说治您的风湿很有效，下次回去就带给您。您放心，我很好，我还在吃大苹果呢！什么？您不信，好，您听我吃大苹果的声音。说着，这位民工对着手机，用嘴发出嚼动的声音。怎么样，听到了吧，我说没骗您吧。好了，有什么话下次再说吧。小伙子关起手机，用沾满污泥的大手揉了揉眼睛，随后，又埋起头，干起活来。

瞬间，让在一旁的我，听得目光里一片晶莹。此时此刻，这位民工向母亲说出“我很好”三个字，让人百感交集。还有什么能更让母亲放心的话呢？一句“我很好”，就让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亲，把一颗高悬的、忐忑不安的心，轻轻地放下来。那一刻，我看到，天边的一片彩霞显得分外妖娆。

记得刘若英演唱过《我很好》这首歌。歌中唱道：“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伤痕也要一种骄傲，就算明天整个城市要倾倒，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歌声中，有一种伤感，有一种缠绵，有一种涟漪，更有一种力透心扉的绝决和凛然。那一刻，我有一种瞬间的恍惚和心动，感到生命中有了一种永恒。

一句“我很好”，就将尘世间的一切，都幻化成最坚强的果敢和勇气，诠释出一种最美的语言和行动，那就是：温暖和爱。

“票证”的故事

□叶延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许多的变化中，有一种悄悄发生却影响深远的变化，那就是老百姓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少了一种叫做“票证”的东西。20岁以下的年轻人，多数不知道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票证曾经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30年前，中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在老百姓生活里，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票证。几乎所有与老百姓生活发生关系的物件，都曾经需要“凭票供应”。那个时候，真是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买东西除了花钱，还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在“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后期，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票就能买到。粮票、肉票、油票，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几十年都是“按人分配”。如果你没有一个城市户口，领不到票证，那么你在城里根本无法生活下去。

“文革”后期直到改革开放前期，我所在的那个城市，还发副食票，一人一叠票，票上有号码，每个月商店就公布：“五号糖半斤，六号花椒二两，七号豆瓣酱半斤，八号糕点半斤，九号乙级香烟两盒，十号火柴五盒。”最让人难忘的还有蔬菜票，就是说菜摊没菜卖了，便用豆子顶替，凭票可以买蚕豆和黄豆，或者不买黄豆，买几块豆腐也行。说实在的，那时天天闹革命，生产上不去，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各级政府先看有多少饼，再数有几张嘴，用除法一算出来个数字，就发张票给老百姓，人人都能有一份。那个年代，贪污腐败听到的也不多，就那么几张饼，没多余的，想贪也难啊。记得直到改革开放之初，还有四大员之说，就是说，这四种人最牛皮：“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售货员。”怎么他们最牛？看病的，可以开好药、开假条，相当厉害。开车的，可以到乡下到外地带点土特产，也不简单。人事干部，代表组织给你一个好岗位，美死了你。售货员，割肉的时候刀刃歪一点，称秤的时候秤砣高一点，都结人缘。

那年月，绝大多数老百姓日子真是简单，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数不上两天就光了。买什么都有票证，也不用在商店里瞎逛了。集中精力搞革命，天天写批判资本主义的发言稿，最常写的就是“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我们就要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到底！”

计划定得再好，生产上不去，仓库里没东西，不发放票证也不行。北京原先有个“工业券”，就是商店里好东西摆了不少，但你是外地人，你再有钱也买不去，要用“工业券”。手表、自行车、电视机要什么有什么，但只有北京人手上才有“券”。我那年上北京，买了一双尼龙袜子，还是老姐花了“券”买的。回到我那穷山区的学校，臭美了大半年。说实在的，那时候城里人比乡下人牛气，牛就牛在除了多几张十元的人民币（那时候没有一百元，城里人一月能挣一百元的也没几个。），还多了一叠子“票”。没票，进了城，除了喝凉水，其它的只能看。

当然，也有一点照顾的，还会有走后门的，里面的门道有多深，说不清。对老同志的照顾也有“票证”，也按计划分配。我母亲参加革命早，算红军时期的红军干部，倒霉挨整也早，一进城不久就丢了党票和官职，下放到山区去当一名中学教员，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平了反，回到省城住进了老干部休养所养病吃药。老母亲在山区教学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困难时期，食堂里没有一星点油，人人都饿得慌，许多人得浮肿病。这时候，县里发给我母亲一本票证：“红军票”。凡具备红军资格都有，不问犯过没犯过错误。凭这红军票，我家每月有一斤肉，两斤黄豆。买回的肉从来没有整块的吃过，瘦的剁成末，肥的熬成油，凝在油罐里，每天放一勺，让菜汤里有点油香气。就是这一张“红军票”，老太太感叹多少次：“党组织还没忘了我啊，自己受点委屈算什么哟！”回想起这情景，让我心里还阵阵酸涩。

中国人总算熬过那些最困难的日子了，票证也悄悄地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最后记忆的细节是在1994年我调到北京工作。按老规矩到公安局办了户口迁转证明，还到粮食局转了“粮食供应关系”。到了北京，户口到派出所报上了，这“粮食供应单”却没有人收了，因为这一年粮票不再使用了。废止使用粮票是个标志，中国老百姓告别了“凭票供应”的短缺经济时代。老百姓见面打招呼，不再问：“您吃过了？”开始说：“最近在哪能发财呀？”

票证消失了，我们开始说一个新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丝忧虑

□韩三洲

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人，世居北京，自幼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清末便已有文名。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为崭露头角的年轻梅兰芳指点分析，捧梅甚力，后来索性做了梅兰芳的入幕之宾，专门编戏，成了名副其实的“戏袋子”。齐如山编写了大量新戏如《天女散花》、《廉锦枫》、《洛神》、《霸王别姬》、《凤还巢》等等，开创一代新风，为创建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他的倡议奔走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梅兰芳曾几次出访日本、美国及欧洲，使中国京剧得以弘扬海外，跻身于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之林。就是在这些懂历史、知音律的“梅党”文人们幕后主持之下，加上梅兰芳本人的闻过则喜与从善如流，才使古老的京剧高度发展成为雍容华贵的中国艺术。故此，有人说过，没有齐如山，就没有梅兰芳。看过齐如山的自述，也相信旧时文人所信奉的“君子交绝，不出恶言”，他何曾用过如此卑鄙而拙劣的手法来暗地里雇凶杀人好惊散这对野鸳鸯呢？他哪里会用近似出卖的手段在梅兰芳多次拒绝日本军队对他发出的演出邀请时，却暗中冒名向社会公布梅兰芳即将复出的消息呢？

还有银幕后面的几段历史不妨说说。即便是在“梅党”文人里面，也是良莠不齐的，如为梅兰芳办理文案、参谋剧情的著名文人黄秋岳，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七七事变”之际，南京政府要对停泊在江阴以西长江上的日军军舰实施沉江封锁的重大军事行动，可是未及动手，黄秋岳竟将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出卖给日军，让日舰抢先一天溜走。蒋介石大为恼怒，严令破案，黄秋岳后被查获，以汉奸罪处决。

还有，日伪时期，梅兰芳南下避祸是有，后来在上海的蓄须明志也有，但过的都是有惊无险的寓公生活，与日本人正面交锋的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抗战之前，梅曾赴日演出两次，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梅兰芳曾组织过联合义演，还捐了1万大洋给日本。所以，日方还是要“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向盛名之下的梅兰芳下手的。再有那个人称“冬皇”的孟小冬，虽心高气傲，才情过人，却两度为妾。先是嫁给梅兰芳，仳离后又说“不嫁则已，要嫁就要嫁一位跺脚乱颤的人”。知道后来她花落谁家吗？嫁的竟是“海上闻人”青红帮头子杜月笙。

这就是梅兰芳所生活和成长的那个复杂而凶险的时代。如果曲解人物，或是贬低别人来抬高主角，那编导者走的，怕依旧是“高大全”的那一套路子。齐如山的后人，在台湾和内地都有，不知他们看到这部影片，将作何感想？假如他们也来对簿公堂索要名誉权的话，不知编导们又将如何自处？



一款高档手机，70%的功能都是没有用的；
一款高档车，70%的速度都是多余的。 【漫画】赵春青

折腾自己

□王如明

人是喜欢舒坦的动物，怎么舒坦怎么来。而我，不断折腾自己，专叫自己“不舒坦”。

家住远郊，距市中心15公里，常进城。单位大多数人进城一是乘公交，二是打的，三是骑摩托，禁摩之后改为电动自行车。我呢，几十年一贯制，骑自行车。别人说，别省钱了，该买辆电动自行车了。我说，买得起，就不买，就是要折腾自己。人不能太舒服，出门坐车，回家坐沙发，上班坐椅子，坐得肚子大了，身体笨了，病也多了，怎么行！报纸杂志的编辑见我总骑自行车过来，一次次地惊呼：“老王你真行哟，30多里，回回自行车！”我一笑：“折腾自己！”城中的老母亲心疼我：“咋恁知道省钱，一块钱车票也舍不得买，看把你累的！”我笑笑：“不累，锻炼身体。”

舒坦的孪生兄弟是惰性。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惰性。身体懒惰能不动就不动，思想懒惰费脑筋的事就不干，办事懒惰今天的事推明天。针对人的这三项弱点我订出计划：身体不想动强迫自己动，早上必须去跑步，活动一小时；晚上去散步，坚持一小时；做饭、洗衣、拖地权当脑力劳动后的放松和调节。治思想懒惰的方法是订立读书、写作计划，自我督促，及时检查，没完成就罚，少睡觉。写作是治思想懒惰的良方，不思考，不深入思考，就写不出好文章。治办事懒惰的方法上班靠同事，退休在家靠家人，虚心接受批评，勤奋做事，日清月结，不留尾巴。

人都崇尚美食，“五味令人口爽”嘛！我把这个“爽”字理解为美食伤身。现在生活好了，大鱼大肉，无节制地饕餮；琼浆玉液，放开肚皮豪饮，实暴殄天物，伤残自身。我牢牢管住自己的嘴，几年下来，体重从超负荷的160斤减掉近40斤。你别说，和自己对着干，真有好处，现在骑车再远不喘，走路健步如飞，感到精神矍铄，身心轻松，真是倍儿棒！

折腾自己，别有滋味，坚持下去，甘甜自知。

枪 缘

□张宗明

枪，这东西很怪，有人觉得它冷冰冰的，总与是非联在一起，于是，避之惟恐不及，而许多因机缘遭遇了它的人，却会在多年的厮守中生出暖暖的情，难舍难离。杨永义算得上是与枪有缘的人。

老杨是蚌埠铁路公安处的枪管员，他的“枪缘”那是有年头了。从第一次摸枪至今，整整35年。尽管杨永义的人生角色多次转换，30多年来，枪始终与他同进退，共荣辱。

1973年冬，高中毕业的杨永义应征入伍到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部警卫连当兵。在新兵连的实弹射击中，生平第一次打枪的杨永义五发子弹打出了47环。“我还有这大的本事”？杨永义心中窃喜。杨永义至今还记得那天的情景：班务会上，山东籍的老班长让他谈谈自己实弹射击的经验体会，杨永义应声答道：“牢记老班长训练时讲的要领，三点成一线，缺口对准星，没想到一打一个准。”激动得有些手足无措的他边说边比画，引得全班战士哄堂大笑，看大伙笑，杨永义也跟着乐，还大声重复道“三点成一线，缺口对准星，别的没有了。”

在接下来的实弹射击中，杨永义数次5发子弹命中49环。“一次打个好成绩那是瞎猫撞大运，次次都打好成绩就另当别论了，看来我是真对打枪有天分呢”。于是他训练就更上心。认真换回的自然是佳绩连连，凭这，杨永义被抽调到了海军射击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76年，杨永义转业到蚌埠铁路公安处工作，发挥自身强项，依旧与枪为伍。有同事开玩笑说：枪跟杨永义，比老婆跟他都亲。而枪在杨永义眼里“就跟自己身上的物件，天天随着，30多年了，没啥特别的感觉。”他能在十秒之内完成一支枪的装卸，什么85式狙击枪、92式手枪、56式冲锋枪、18.4毫米防暴枪，都不在话下。那个麻利劲，丝毫看不出他如今已是年过半百的人。

在华东铁路公安系统，杨永义是出了名的神枪手，神到什么程度？他1995年打出的手枪50公尺慢射187环的纪录至今没人能突破，13年没人越过他定的这道“坎”，让人不服都不行。

随着年龄的增大，1999年底杨永义经历了职业上的又一次“转型”，由射击选手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射击教练。

“干啥都得要干出个样来。”几年里，他累计办过30期射击集训班，约有300多名射手接受过他的严格训练，其中20多人后来成长为铁路公安系统声名鹊起的“神枪手”，因此杨永义还得了个“金牌教练”的雅号。

女射手黄蕊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次参加安徽省比赛，带队的书记用上了“激将法”，他郑重地说“黄蕊，你第一个上场，打个满环给大家伙儿壮壮威。”黄蕊看了看一旁的杨教练，杨永义毫无表情地点点头。真不含糊，黄蕊上阵后“砰、砰、砰、砰、砰”，五连射后就听报靶员大喊“50环”。那次比赛，黄蕊最终以97环的成绩夺得了女子64式手枪射击的冠军。

杨永义执掌帅印的蚌铁公安射击队，自上世纪90年代参加省前卫体协组织的射击赛以来，连续几届包揽了全部奖牌，弄得其他地市的射击领队联合向前卫体协提建议，要求准备两份奖牌，一份给蚌铁射击队，一份由其它省市比赛竞争。这个小笑话使杨永义和他的射击队一下子声名远播了。此后，杨永义和他的射击队多次代表省前卫体协出赛远征，均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杨永义说：射击玩的是细活，像绣花，心静才出细活、出好活。长期的经验使杨永义得出个结论：好的射手不是靠子弹“喂”出来的，而是要具有超乎常人的自控力，高水平的比赛最终都是在赛心态。

邹怀勇是他的“高足”，一段时间成绩不稳定，大赛前心急，跑来找杨永义：“我有时感到射出两发弹，着弹点和方向完全一样，结果怎么会是一发10环，一发跑靶呢，真奇了怪了。”

“这是心态不好，总想在瞄准后停定击发，其实射手举枪时手无依托，不可能绝对停定再击发，要在微动中扣动扳机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邹怀勇心中暗忖。将信将疑的他上了靶场一试，果不其然。

队员小乔，握枪有个错误的“小动作”——手腕过硬，造成弹着点总在靶左上偏7环处，杨永义手把手地给他纠正，要他拇指放松，中指、无名指加力，训练时还总盯在小乔身后不时喊“松，松点”，半个月喊下来，“松，松点”竟成了队员们戏称小乔的代名词了。

杨永义与枪为伍，围绕他的并不总是荣誉的鲜花和奖杯，他也遭遇过惊险的场面。一次，杨永义在训练瞄靶，正全神贯注、物我两忘时，忽然一颗子弹从身后射出，擦耳而过，惊出了老杨一身的冷汗。原来，身后有位女射手瞄靶时太紧张，不知不觉中将塞耳朵的子弹上了膛，失手走火，险些就把杨教练给“毙”了。还有一次，由于一男射手将手枪扳机调得很轻，打靶时手劲掌握不住，一个连射，枪震荡的反作用力使枪反弹离手，在地上团团乱转时还射出了一发子弹。杨永义当时也是后背被吓得冰凉，半天才醒过神来。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在新警训练时一位女警由于紧张，提枪时扣动了扳机，将自己的脚打了个洞。吃一堑，长一智，多年的实弹射击经验使杨永义懂得了一个硬道理，“对枪，是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一点点差错”。

2005年，杨永义又“转型”了，由教练员变成了全职枪管员。枪管员虽不是啥官，可责任重大，安徽境内的19个铁路车站派出所的枪弹分布，用当地的土话说，老杨是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为了及时掌控枪弹的管理现状，杨永义一个所一个所地跑，亲自查，亲眼看，亲自记，3年过去了，杨永义管枪管得是天衣无缝，没出丁点的差错。

其实，与枪打了30多年交道的杨永义，还是存有遗憾的。1974年他在全海军打了个半自动步枪第四名，原本是要代表海军参加全军大比武的，但领导考虑他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于是将名额让给了一名将要退役的老队员，使老杨一辈子失去了在全军比赛中拿奖的机会。更让人遗憾的是，打了近百场比赛拿过十来次冠军的杨永义，竟然从来没立过功。了解内情的人知道，杨永义不是没机会立功，而是他总把机会留给了别人。

闲说焦屑

□梁京

早上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柜子里掏出一袋焦屑，我看见了，惊讶地问，怎么现在还有这个？母亲笑了，托熟人买的。我不满道，有现成的早饭，干吗还吃那个，又没营养。母亲只轻轻说，你懂什么。随即拿来碗勺，挖了半碗焦屑，加上一勺白糖，倒进滚烫的水，搅一搅，就是一碗糖焦屑。

焦屑似乎只我家乡才有，我以为是大麦小麦粉之类的炒出来的，汪曾祺也提到他故乡有焦屑，是用锅巴磨碎了成粉，好像做法不太一样，当然他吃的年代距离我现在已经很远，也许制法变了，但名字还叫焦屑。记忆里我对焦屑从没有过好印象，从小到大吃得太多了，它总是和云片糕一起被买回来，给我放学回来当点心用。那时候我父母经常加班，总是回来得晚，焦屑就被我当饭吃，我总是在里面放很多糖，泡开后变成糊糊地一团，又甜又腻，实在没有滋味可言。偏偏这东西相当饱人，一碗下去就差不多果腹了，等父母回来做好了饭，我已经吃不下其它，匆匆骑车去学校晚自习，到八九点时肚子又空了，忍着饿，深夜回来再吃一顿宵夜。所以焦屑总给我带来饥饿的感觉，后来有时候做梦，梦见吃焦屑，也是腹中饥饿，不然不会想起的。

然而我母亲还一直有吃焦屑的习惯。市面早买不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做，只能托人打听，谁家闲来无事，炒炒焦屑。买回来就收进抽屉里，隔三差五吃上一回，我问母亲，真的好吃么？我现在的早饭不是小米粥就是燕麦片，已经忘了焦屑的味道了。母亲说，也没什么好吃的。挖一口放进嘴里，继续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念念不忘，兴许是年纪大了……我笑道，我小时候可是吃厌了呢。母亲也笑，不只你，我小时也不爱这个。

我听母亲提过，外婆自己会做焦屑，常常做上整罐放着，兄弟姐妹谁饿了谁就去挖，有客人来还当做点心招待。我想，母亲是想外婆了。上了年纪的人，需要一种熟悉的味道，在吃中回忆。我凑过去，就着母亲碗里尝了尝，不是很甜，但没我想象中的讨厌。我去加了两勺焦屑，一勺白糖，跟母亲一人一口，完成一顿早餐。

这大概是回忆的味道，每个人都有，其实还是那样东西，总是因为想得太多的缘故。不想也罢，凡事想得太多是不行的，焦屑如此，其它也如此。

资讯快递

西部民歌王子出征维也纳

本报讯（记者张宪）2008年12月13日，素有“西部民歌王子”之称的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将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独唱音乐会。记者从12月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音乐会演唱的曲目不仅包括哈萨克、维吾尔、蒙古、藏族等民族的代表作品，还融入了陕北、青海风情。音乐会团队阵容空前强大：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印青总策划，春晚著名导演郎昆任总导演，多次出现在国际舞台的李心草任指挥，主持人杨澜，波兰国家交响乐团倾情合作演出。即将踏上征程的王宏伟把此行定义为一个艺术作品展示而非单纯的演唱会。他表示，要把民族文化推向国际，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

《开眼》首发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杨兆敏）著名作家赵瑜、柴然创作的报告文学《开眼》近日已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国家电网公司户户通电工程的长篇报告文学。12月6日，该书的首发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据介绍，为写作《开眼》，两位作家先后赴江西、福建等8个省份的老少边穷地区，历时近1年完成采访和创作。该书以鲜明的主题、感人的故事、细腻的笔触，真实记录了国家电网公司推进户户通电的艰辛历程，反映了户户通电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讴歌了电网员工为农民群众利益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